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欧洲抵抗运动

罗志刚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欧洲抵抗运动

罗志刚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昌路 昌隆 250°01)

武汉图书发行所

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320页 1.10万字 1990年12月

ISBN 7-307-01001-0

001-1-1000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年12月

普 通 志 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欧洲抵抗运动

罗志刚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0印张 256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307-00959-5/K·74

定价: 4.10元

序 言

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反法西斯国家军队进行正面作战，同轴心集团鏖战于世界各个战场之际，世界人民在法西斯占领区和法西斯心脏地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勇敢地开辟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新战场。这一运动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人民战争，遍及欧、亚、非大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法西斯主义的强烈仇恨、争取民主和自由、恢复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坚强意志。而且，其参加国之多、规模之大，成就之巨，为历次世界人民运动无法比拟。在强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抵抗浪潮中，欧洲抵抗运动尤为气势磅礴，这是欧洲各国人民用血泪艰辛写出的一部雄壮史诗，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欧洲抵抗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内在紧密联系，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日起，欧洲抵抗运动就诞生了。特别是在1940年法国败降、英军撤出大陆到苏联卷入战争这一期间，整个欧洲大陆上只有被占领国和法西斯国家的人民在进行着抵抗，坚持高举着反法西斯的斗争大旗。整个大战过程中，欧洲抵抗运动的洪流一直奔腾不息，表现出它是大战中一个持久的强大的战略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带有的特点更赋予欧洲抵抗运动以重要地位。这场大战是作战双方实行全面动员的总体战，即是说，它不仅是陆战、海战和空战无所不有的全球战争，还是一个除军事战以外，包括着经济战、政治战、心理战、意识形态战的综合

体，实质上是多国综合力量的大搏斗。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就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部纯粹的激烈军事战争史，还要被看成是一部复杂的政治、经济、心理、意识形态的全面斗争史，这是二次大战不完全同于以往战争的一个地方。欧洲抵抗运动理所当然地列入二次大战史，而且还应当在其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在那战争烽烟弥漫全球的年代里，欧洲被占领国人民坚决不承认本国的军事失败是最后的失败，他们和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等各方面打击敌人，对大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使人们在研究二次大战时，有理由重视欧洲抵抗运动，并置之于一个恰当的重要地位。可是，某些人，尤其是有的军事史学家不愿这样看待欧洲抵抗运动。依他们之见，二次大战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由作战双方军队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各个战场的战斗决定的，和一切抵抗运动毫不相干。由于持如是观，他们在自己关于此次大战的著作中，常常对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等给予特别的注意，却很少提及或干脆闭口不提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不管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例如，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就是如此。这种严重的弱点存在于不少关于二次大战的历史书中。

但也要看到，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承认欧洲抵抗运动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对它进行认真的全面考察，才能对二次大战获得真知灼见和深刻理解。英国史学家C. 沃德豪斯在强调研究欧洲抵抗运动的重大意义时，特别指出：“这种研究是需要的，也就是说，要把抵抗运动作为整个大战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进行研究，要在对所有发生抵抗运动的国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研究。”^① 其实，

^① 约恩·黑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1939—1945）》，伦敦1981年版，第8页。

早在二次大战初期，英国经济作战部部长休·多尔顿就意识到欧洲抵抗运动的重要性，称之为与传统的海、陆、空三军等量齐观的“第四军”。不管这种提法是否妥当，却最早指明了欧洲抵抗运动是二次大战中一支重要的突起异军。事实上，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并不全在于它对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的直接影响，它对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世界格局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作用，还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丰富斗争经验这份十分宝贵的财富。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由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军队的正面作战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共同组成的，如果不研究抵抗运动，既不能正确地深入理解战争本身的历史和科学地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也不能正确地深入理解战后欧洲各国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因此，对我们来说，加强对欧洲抵抗运动的认识和了解实属必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该研究二次大战中的各次重要战役，如1940年的英伦保卫战，1941年的莫斯科保卫战，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1942年的北非战役，1942—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役，1945年的柏林进攻战役，也不仅要研究莫斯科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历次重大国际会议，还应该研究大战期间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特别是欧洲抵抗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欧洲抵抗运动的工作不能长期停留在孤立地，逐国地叙述抵抗运动史的水平上，而需要把欧洲抵抗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从世界大战的全局高度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总体上去认识欧洲抵抗运动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根源、动力、特征和本质，以及它对整个大战的影响与作用，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欧洲抵抗运动和大战之间的内在联系。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欧洲抵抗运动的全貌，揭示其发展规律，确定其在大战中应有的历史地位。当然，把欧洲抵抗运动当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并非要人为地抹煞各国抵抗运动之间的差异，恰

巧相反，正是为了通过比较去发现差异，说明差异形成的原因。

研究抵抗运动，首先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何谓抵抗运动？国外学者早就作过一些回答。例如，长期从事抵抗运动史研究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教授曾建议：把反对占领者的一切斗争形式，包括宣传、罢工、游行、侦察活动和武装斗争都看成是抵抗运动。^①后来，他又提出：“被占领国家中任何反对纳粹占领者的活动，无论其形式和动机如何”，都在抵抗运动之列。^②苏联学者А. 博尔金教授指出，应把“抵抗”一词理解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一切形式和手段，从公开表示抗议到武装斗争。”^③以上这些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令人略嫌不足。在我们看来，抵抗运动不只是发生在被占领国内，同时也发生在法西斯集团国家中，所有这些国家一切社会力量进行的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及其帮凶的、推翻法西斯统治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本土的和国外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斗争都属于抵抗运动。这就是说，欧洲各国人民争取恢复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切斗争，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抵抗运动。根据这种认识，我们不能同意西方某些作者在德国抵抗运动问题上的观点和做法。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把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反希特勒派的谋杀哗变活动视为抵抗运动，甚至把它当作德国抵抗运动的主体或唯一代表大肆加以肯定，而把德国抵抗运动的真正体现者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① 《1939—1945年欧洲抵抗运动（1958年9月14—17日列日—布鲁塞尔—布伦东克第一届抵抗运动史国际会议文集）》〔以下简称：《1939—1945年欧洲抵抗运动（第一届抵抗运动史国际会议文集）》〕，伦敦1960年版，第12—21页。

② 《1939—1945年欧洲抵抗运动（1961年3月26—29日米兰第二届抵抗运动史国际会议文集）》〔以下简称：《1939—1945年欧洲抵抗运动（第二届国际会议文集）》〕，伦敦1964年版，第576页。

③ 同上，第639页。

即至多作为反希特勒派阴谋活动的陪衬而轻描淡写。事实上，这是对德国抵抗运动的曲解。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反对派只是对希特勒个人的具体做法而不是对第三帝国的侵略政策感到不满，只是要推翻希特勒的“元首”政治，决不是为了彻底反对德国法西斯对别国人民的奴役和统治，也决不是为了建立德国的真正民主制度。因此，与其把他们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斗争视为抵抗运动，不如看作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上层分子之间的权力争斗。对于德国反对派制造的1944年“7·20”事件，恐怕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研究欧洲抵抗运动，还必然涉及到它和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关键是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特别是不能够毫无根据地任意夸大或贬低苏、美、英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大量事实证明，欧洲各国抵抗运动得到了苏、美、英的帮助和支持，这种帮助和支持对抵抗运动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它抬高到决定一切的地位，而否定各国内部种种因素对抵抗运动的一切斗争形式、内部结构、发展特点和水平的重要影响，实质上，抵抗运动是每个国家内部社会政治关系的特点的反映。不用说，有根据地说明苏、美、英国家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消极作用同样是有必要的。

100 欧洲抵抗运动已结束近半个世纪了，但迄今为止，要全面地了解和科学地总结它的历史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首先是因为这方面的史料不是很丰富的。在二次大战的特定条件下，任何国家都无法把本国广大范围内的一切抵抗活动都详尽无余地记录在案，何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秘密的、隐蔽的斗争，也无法把所有关于抵抗运动的资料象政府文件一样妥善地保存至今。尽管这样，数十年以来，世界各国史学家们还是尽力克服各种困难，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和研究资料的工作。早在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年代，西欧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机构，

为研究欧洲抵抗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取得不少成绩。例如，早在1944年底成立的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委员会的合作者们，写出了大批有关抵抗运动的专著，其中很大一部分著作是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各抵抗组织的活动的。1945年荷兰成立的军事情报研究所，出版了一批关于德国法西斯占领荷兰和国内抵抗运动的文件和专著。除了由本国政府拨出经费进行活动的国家研究机构外，还有一些自发建立的社会学术组织，如意大利的全国解放运动史研究所和设立在托斯康（岛）的抵抗史研究所等。所有这些机构出版的专著与其他著作披露了许多对研究很有价值的真实材料。仅在大战结束后的20年中，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一系列国家都有关于抵抗运动的各种体裁的大量著作问世。

为了推动对欧洲抵抗运动史的深入研究，各国从事抵抗运动史研究的学者们曾多次举行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各种问题。1958年9月，第一届抵抗运动史国际会议在比利时的列日、布鲁塞尔和布伦东克举行，为期4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荷兰、西德、丹麦、挪威等国的历史学家和抵抗活动家，但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这次会议已反映出，人们对欧洲抵抗运动史上的某些问题的看法存在着重大分歧。1959年11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也举行了同样内容的国际会议，与会者来自15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1961年3月26—29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意大利主要抵抗运动中心之一米兰市又召开了第二届抵抗运动史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会议的有来自20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抵抗运动参加者。此后，欧洲抵抗运动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把它作为讨论专题或重要内容之一的国际会议接连不断，如1962年的华沙国际会议，1963年的卡尔洛维一伐里（捷克斯洛伐克）国际会议，1965年的维也纳会议，以及布拉格国际会议。1961年6月，为了起到推动研究和教育人民群众

的作用，苏联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还举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欧洲各国抵抗运动展览会”，展出了关于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等许多国家人民反对法西斯制度和希特勒占领的斗争的书籍与文章。

同时，研究欧洲抵抗运动决不只是有学术方面的意义，还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人们将从各国抵抗斗争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吸取力量、智慧和斗争经验，更好地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研究抵抗运动，不能不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反动的法西斯占领制度，这在当前更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虽然二次大战已结束多年，但直到现在，世界上某些地方还存在着幻想复活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因此，远远不能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已完全根除。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对二战时期法西斯统治制度反动本质的揭露，鞭笞法西斯的残酷民族压迫政策，就能进一步唤起世界人民对新的战争危险的警觉性，推动他们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不断作出努力。特别是对于未经过那个创巨痛深的战争年代，对德、意法西斯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空前民族灾难了解甚微的青年一代，研究和宣传抵抗运动史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截止目前，我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史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无论是这方面的研究基础还是研究力量都相当薄弱，与世界各国研究水平相距甚远。为了在这方面尽快赶上他国，以适应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进行巨大的努力，认真加强对欧洲抵抗运动史的研究。

本书只是研究欧洲抵抗运动的初步尝试，拟定的目的是：
（一）勾划欧洲抵抗运动的轮廓；（二）探求每一重大时期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特点和原因；（三）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某些重要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由于资料和作者的水平有限，这些目的是否能够完全达到，殊无把握，至于疏漏不当之处则在所难免，恳切地期待着史学界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欧洲抵抗运动的兴起 (1939年9月—1941年6月) (1)

第一节 抵抗运动的根源和欧洲“新秩序” (1)

第二节 抵抗运动风暴席卷欧洲 (12)

第三节 初期抵抗运动的特点 (51)

第二章 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 (1941年6月—1942年底) (61)

第一节 苏德战争爆发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影响 (61)

第二节 消极斗争的加强 (69)

第三节 武装斗争的加强 (88)

第四节 走上联合抵抗之路 (108)

第五节 苏联沦陷区人民掀起反占领斗争 (122)

第三章 欧洲抵抗运动的高涨 (1943年初—1944年6月) (136)

第一节 大战进程的根本转折和抵抗运动的高涨 (136)

第二节 武装斗争地位的上升 (147)

第三节 民族联合阵线的广泛建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胜利发展 (181)

第四章 欧洲抵抗运动的胜利 (1944年6月—1945年5月) (198)

第一节	苏联沦陷区人民抵抗运动·····	(200)
第二节	西欧和西北欧被占领国人民抵抗运动·····	(203)
第三节	东欧和东南欧被占领国人民抵抗运动·····	(218)
第四节	法西斯国家内部人民抵抗运动·····	(237)

第五章 总论····· (251)

第一节	性质·····	(251)
第二节	形式·主力·领导者·····	(257)
第三节	发展不平衡·····	(264)
第四节	苏、英、美的战时政策与欧洲抵抗运动·····	(277)
第五节	历史地位和作用·····	(290)

后记····· (307)

第一章 欧洲抵抗运动的兴起

(1939年9月—1941年6月)

第一节 抵抗运动的根源和欧洲“新秩序”

在许多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民族抵抗运动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社会现象。就欧洲范围而言，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有过胡斯革命运动，意大利有过加里波的运动，巴尔干人民长期进行过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奥匈帝国被压迫各族人民掀起过解放斗争以及波兰人民举行过起义，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人民进行过反对普鲁士侵略军的爱国斗争，等等。1939年9月二次大战全面爆发后，欧洲范围内的民族抵抗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突出，抵抗运动的巨大风暴席卷法西斯国家侵占的一切国家，甚至法西斯国家本身。对于这种历史现象，人们的解释是很不一样的。某些西方史学家认为，这种广泛展开的强大抵抗运动只是一系列偶然因素诱发的结果，例如，是由于希特勒占领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他们断言，如果占领制度灵活一些，抵抗运动就不会发生。一位作者在评述德国法西斯在苏联的占领政策时说：“德国人错过了一个可以创立一个独立、友好的乌克兰的大好机会，反而把数以千计的可能拥护德国的乌克兰人变成怨恨的和坚决的敌方游击队。”^①有的人虽然看到德国法西斯分子的野蛮行径和抵抗运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没有揭示出这种野蛮行径不过是法西斯侵略

^① 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25页。

政策下的一个必然现象。

我们认为，二次大战中的欧洲抵抗运动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根源，而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首先，德国法西斯发动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对全人类的命运构成最严重的威胁。这就决定了欧洲各国人民对法西斯占领者和统治者的根本反对立场，引起他们的广泛抵抗运动。其次，欧洲抵抗运动是受了欧洲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革命与反侵略传统的影响而出现的。例如，1941年春，希腊人民在国土沦丧后立即奋起同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斗争，其巨大动力源泉就是1821年革命和后来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光荣传统。^①不过，必须说明的是，革命和反侵略传统既不是欧洲抵抗运动的唯一因素和根源，也决不是主要的因素和根源。传统的力量很大，但总是有限的，离开了现实社会的土壤，它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因此，我们在肯定传统因素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时，不可人为地把它抬高到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位。再次，欧洲抵抗运动和战前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反战运动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不可否认，二者是不大相同的两种社会背景的产物。反法西斯反战运动主要发生在30年代，即二次大战的序幕——局部战争时期。那时，德意法西斯集团力图把全面侵略战争和奴役制度强加在欧洲各国人民头上，欧洲的和平与安全面临严重破坏的威胁，但武装侵略还是个别现象。欧洲抵抗运动则发生在德波战争业已爆发，世界进入全面大战的时期。此时，德意法西斯集团通过武力扩张，已将侵略铁蹄几乎踏遍欧洲大陆，到处建立残酷的占领制度，对欧洲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尽管社会背景如此不同，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不仅表现在它们都以国内外法西斯势力和统治集团为打击目标，都以反对法西斯主

^① 格奥尔吉·佐依季斯等：《希腊民族抵抗史（1940—1945）》（俄译本），莫斯科1977年版，第35页。

义、维护民主与自由为基本任务，更表现在反法西斯反战运动为后来的抵抗运动积累和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打下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斗争前提。难怪法国史学家若安涅斯和维拉尔特别指出，如果谁认为1940年的法国抵抗运动是凭空产生的，与过去发生的事件没有联系，那你就无法分析抵抗运动的政治和内容。^①不难看出，反法西斯反战运动是抵抗运动的强大政治思想基础，抵抗运动是反法西斯反战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背景、斗争方式和反抗的激烈程度上，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防止法西斯国家挑起侵略战争并将它发展为全面大战，是反法西斯反战运动的重要任务，而欧洲抵抗运动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则是以革命战争制止法西斯国家已成功挑起的侵略战争，迅速结束大战；欧洲抵抗运动的打击对象比反法西斯反战运动更广，不仅要打击欧洲一切法西斯势力和统治集团，还要打击被占领国的一切通敌政府和投降分子；至于历史地位，反法西斯反战运动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反战运动的一部分，而欧洲抵抗运动进而上升为伟大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强大战略因素，等等。总之，决不能把大战中的欧洲抵抗运动和战前的反法西斯反战运动混为一谈，不加以任何区别。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不能同意把战前反法西斯反战运动纳入欧洲抵抗运动的范畴，即使和抵抗运动有很多共同性的西班牙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如此。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欧洲抵抗运动失去自己的某些重要特点和实质，无法表明固有的全部规律。^②

最后，当我们把目光移向二次大战这一时期时，发现欧洲抵抗运动遵循着一般民族抵抗斗争发生的规律，归根到底是由法西斯国家推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所引起的。这些政策集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欧洲抵抗运动），莫斯科1966年版，第285页。

② 参见：〔苏〕《近现代史》，1985年第3期，第74页。

中地表现为德国强加在欧洲被奴役国家人民头上的法西斯统治制度，希特勒分子美其名曰“新秩序”。

德国法西斯的反动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是希特勒分子继承近代德国军国主义扩张传统，为建立“大日耳曼”帝国而推行称霸世界计划的必然产物。尚在1919—1923年德国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纳粹党内部就产生了有关德国外交政策的各式各样的看法。^①1920年2月14日纳粹党宣布的《25条纲领》，在集中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和提出了德国应该向外扩张，夺取包括殖民地在内的领土以主宰世界的狂妄主张。后来，希特勒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以及他的第二本有关德国对外政策的书即《希特勒秘籍》中，进一步说明了扩张计划，而且比在其他任何场合更露骨更完整地阐述了他对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的看法。人们从这两本书中不难发现，构成希特勒侵略扩张计划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纳粹运动一直在竭力鼓吹的“生存空间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毫不掩饰地提出：“唯有地球上充分之空间，才能保证一民族之生存自由。”他认为，德国人口过剩，“人口与疆域不相称”，造成了“空间灾荒”。^②后来，他在《希特勒秘籍》中，继续发挥了这种荒唐的论调：“德意志民族自从历史性地进入世界历史以来，就一直处于空间危机之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德意志民族就不能增殖。”^③按照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德国不仅要在欧洲夺取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且要把侵略扩张矛头指向海外殖民地，由自己接受英、法的殖民遗产。希特勒分子还考虑到，占领欧洲后进攻西半球国家，利用“第五纵队”占领它们。可见，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计划实质上是

① 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第三帝国外交政策》，伦敦1973年版，第14页。（《希特勒秘籍》卷8第1章，《希特勒大传》卷2第1章）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商务印书馆发行，第319、321页。

③ 希特勒：《希特勒秘籍》，纽约1983年版，第50、52页。

一个建立德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计划。它后来成为第三帝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

1933年初，希特勒攫取了德国政权，随即开始准备实行这种狂妄的侵略设想和计划。法西斯外交组织遵照希特勒制定的策略，充分利用英、法战胜国之间以及它们和苏联的矛盾，以极快的速度重新武装德国，急切地走上了兼并和武力侵占欧洲各国的道路。希特勒德国从1938年3月兼并奥地利开始，到1942年年中，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只有瑞士、瑞典、葡萄牙、西班牙、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少数国家幸免于难，有可能维持自己的完整和独立。在这种疯狂侵略的基础上，希特勒分子开始建立他们的欧洲“新秩序”。“新秩序”一词首先出现在1940年7月25日帝国经济部长丰克的讲话中。同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再次提到“新秩序”这一概念。该条约规定德、意、日三国瓜分世界，把欧洲划为德、意势力范围，把所谓“大东亚”划为日本势力范围。德、意表示“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不用说，在德国法西斯领导人眼里，欧洲“新秩序”和德国对欧洲大陆的绝对统治是同义词。在“新秩序”的漂亮口号下，怎样实行对欧洲国家的民族奴役和压迫呢？希特勒分子曾动过许多脑筋。早在1939—1940年，第三帝国的中央和各地方的法西斯机构根据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计划，秘密拟定了“实际解决”捷克和波兰民族命运的各种方案，后来又产生了一些“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和有关南斯拉夫民族的方案。但是，拟定出来的诸如此类的各种方案和计划，只成为纳粹占领政策的某种基础，而一直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新秩序”纲领。

欧洲“新秩序”建立初期，德国采取了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两种形式。直接统治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领土并入帝国，作为帝国一部分而接受法西斯统治，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奥地利、苏台德日耳曼人区、但泽和波兰